

# 关于古籍整理的笔谈

## (一)

**编者的话：**我们的伟大祖国，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光辉灿烂的文化典籍。认真地整理和批判地继承历史文化遗产，正确地吸收和发扬中华民族优良文化传统，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，有着重要的意义。因此，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和关怀下，有计划、有步骤地整理和出版古籍，就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这是关系到全国人民的精神生活和子孙后代的大事，理应受到各界人士特别是学术界、文化界、教育界人士的关心和重视。

整理出版古籍，需要作几十年、上百年坚持不懈的努力，是一件光荣而艰巨的任务，又是一种专业性很强、涉及的学科很广而又复杂细致的工作。要真正做好这个工作，就需要各方面有关学科的专家、学者群策群力、通力合作，并随时提出意见和建议，以收集思广益之效。本刊有鉴于此，从本辑开始，特为开辟“关于古籍整理的笔谈”专栏，热切希望关心和有志于此的专家学者，各抒己见。举凡对于有关整理古籍的理论、方针，人材培养，对于某些重要古籍整理的设想、方案，乃至有关古籍整理基本知识和方法问题，如版本、目录、训诂、音韵、标点、校勘、注释、今译等等，都在“笔谈”之列。本刊也欢迎各方面的专家、研究工作者撰写有关古籍研究和整理的专文，惠寄本刊发表。希望围绕着古籍整理这个专题，通过讨论，总结经验，以利工作的进行。“笔

谈”专栏是长期的，本辑发表了周谷城、白寿彝、顾廷龙等九位同志的文章，今后还将继续发表这类文章（以稿件收到先后为序），欢迎同志们踊跃执笔，大力支持。

本专栏在筹办中，得到了各方面和专家们热情支持，李一氓同志不仅来信表示赞同，并应约为本刊题写了“关于古籍整理的笔谈”栏名，在此一并致以谢意。

## 李一氓同志给本刊的信

《文献》编辑部：

信奉悉。《文献》七期亦收到，至感。关于古籍整理出版问题，我尚不能发表什么意见，但各方面和专家们有何意见，我想你们都可以斟酌刊载，以便集中些有益的意见。但到一定时候，我亦可以写点什么给你们。总的来说，亦欢迎你们对我的工作，提些意见，以便有利于古籍的整理和出版。

敬 礼！

李一氓  
十一月十三日

## 对于把古籍译成现代文的意见

周 谷 城

一、先来一个动员。最好由教育部同社会科学院，对全国大专院校，特别是文、史、哲各系，以及全国各文科研究所发出通知，要求开始准备翻译祖国古籍为现代文；翻译古籍的工作与教学、科研同等重要，不能歧视。

二、先发出第一批书单。翻译什么，定出第一批要译的书单。这无妨仍依经、史、子、集之类全面铺开，择要列出，供人认译。时间下限，倒可以限制一下；为着抢译古籍，下限可暂定于六朝（不包括六朝）。经类可列商务印书馆出的“十三经”白文本；史类可暂列《国语》、《国策》、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后汉书》、《三国志》；子类可列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、《墨子》、荀子》、《韩非子》、《淮南子》等十种；集类可暂列《汉魏六朝百三家集》中之六朝以前的集子。经、史、子、集之分当然不妥；经中之“书经”、《春秋》等可请史学家译，史书中之四裔传可请民族学家译，“食货志”等可请经济学家译。

三、认译的办法可略定如下：（1）凡能标点古籍的人，不论有无职业，不论老中青，都可以译；（2）一人译一种或一种之一部分，以自由认译为原则；（3）认译的人如有重复则组成小组另商译法，但仍以一人译一种或一部分为原则（因译本有两种以上不易决定付印也）；（4）几个人合译之书，各人拿出译稿相互提意见，迨意见统一即付印。

四、古籍译本出版，必须两种本子，即原本与译本对照印出：原本用繁体字，译本用简体字。

五、已经译出的古籍，除加工外，不必再译；译出而未印出者料也不少，可登报征求译者献出，避免重译。

六、改编古籍也是整理古籍之一法。例如纪传体史书“二十四史”，或如开明书店加上新元史一同印出的所谓“二十五史”，其中“艺文志”可编在一块为文学史料汇编，“四裔列传”可编在一块为民族史料汇编；“货殖列传”或“食货志”可编在一块为经济史料汇编；“职官志”等可编在一块为政治制度史料汇编；“礼乐志”等可编在一块为教育史料(礼)及音乐史料汇编。有人说，这样做，破坏了正史之完整。其实这是多余的顾虑。如怕破坏，原书依然存在，破坏了什么？但新编的专门史料，研究者参考起来，就方便多了。

七、近人的著作也要赶快找人翻译，例如章太炎的书就非翻译不可。再者三国以后到五四时期(不包括五四时期)的一切书，也要翻译。因为这些书决不是今日读简体字书的人所能读。然而读简体字书的人未必就一定不应该接触历史原料，故我主张这些书也要译；这正如英国人把近代史上文学家莎士比亚之书、经济学家托玛斯孟之书，一律译成现代文一样。

1981年11月于上海

## 关于整理古籍的几个问题

白 寿 彝

整理古籍的范围，可以包含的相当广泛。有版本的校勘，有标点分段，有注释，有专门的分析和评论。对于某种古籍的流传、影响的研究，对于古籍的今译，也属于整理的范围。編集古书的目录，决定古书的印行和复制，也都属于整理的工作。

从现在的需要来看，整理古籍要多、快，要严肃认真，要系

系统化，要多样化，要计划化。现在古籍的需要很迫切，学生买不到书，教师买不到书，新成立的学校买不到书，有多年历史的学校也买不到必须的副本，这大大影响了教学质量的提高、人民文化的提高和科学研究的进展。因此就必须多印古籍，快印古籍，这是当前很急迫的要求。所谓多，是要种类多，照顾的方面多，让多数人都能看到书。所谓快，是要用最快的办法，能够多出书。要利用现成的纸型，要利用现有的刻版，要用影印和复制的办法。有些书，为了便于一般读者，而又来不及标点的，可在原印本上标点、分段影印。总之，要不费太大的加工，使更多的书跟读者见面。但是多、快，并不能草率行事，要严肃认真。例如，对版本的选择，印刷上的清晰，纸张的耐久性，都要注意。系统化，是尽量按书的性质分门别类的印行各种丛书，以便于读者成套的购置。当然，丛书也可以零买，也可以通过不断的零买而配套。丛书在一定意义上，不只为读者提供方便，而且也带有引导读者选择古书的意义。丛书的开本大小，可以一律，版式不必一致，可以尽量利用现成的纸型。对于某些书来说，多样化也是必要的，有的书，既需要就原文加注释、加考证，这是一种形式；同时，它也需要今译，这又是一种形式。有的书还需要补上一些图片、地图、古器物的模拟图。计划化是要分个主次先后。古籍的数量很多，有整理能力的人力有限，物质条件也很不充分，需要有步骤地开展工作的，不能百废俱兴。

目前整理古籍最重要的，还是队伍问题。这个工作是个长期性的工作。随着时间的进展，我们现在的书也会成为古书；我们现在所认为不怎么古的书，也会变为相当古的书；我们现在所承认的古书，将来会成为更古的书。不要认为我们现在把一些古书整理好了，就可以一劳永逸了。今天，我们整理古籍，是按照当前的需要来工作的。我们将来的整理工作，也必然是按照将来的需要来开展工作。一个时期的文化必须是过去时期文化的继续和发展。我们无产阶级要善于继承、发展一切过去的优良传统，

加以发扬光大，为我们的建设服务，这里包含物质建设和精神建设。总结文化遗产的工作，总是会继续不断的。整理古籍也必然是继续不断的。所以眼光必须看得远些，既看到今天需要，也要看到将来需要。抓队伍的建设，现在已经提到了日程上来，不能再延缓了。

我认为，无论采取集中的形式也好，分散的形式也好，把现有的人力组织起来进行整理工作，是很必要的。但是其中有不少人已经是老、衰、病，能支付出的力量已经不多了。尽管如此，我们还要分出一些力量，去培养接班人的队伍。培养的方法可以是各种各样的。可以在有条件的高等院校，开设古典文献专业。可以招古典文献的研究生，也可以对古典文献的研究生成绩好的，授于历史学或语言学、文学硕士、博士学位，也可以吸收一些有水平的大学毕业生，在工作中培养他们。也可以吸收一些中学毕业的优秀的学生，加以系统的专门训练，使他们能更快的投入到工作上来。当然，所有这些成员，都必须在工作上不断提高，不断关心他们的成长。有些工作项目，关系到少数民族史、外国史的整理，都必须有受到专门训练的人材。

我想在这里强调两件事情。一件事情是关于少数民族的古籍和各种手写本的整理，这里包含有调查、编目、出版和汉译的工作。这种工作在各民族地区已经开始，但工作进展不大，工作的队伍太小，这急待于改善。这方面的人材，是需要专门训练的，是需要以国家的力量有组织的进行工作的。又一件事情，是我们应该尽早地把清史馆组织起来。清史的编修是一个很大的工程，其难度要超过过去各朝代的历史。但是在历史工作上，它也很重要，它跟我们现在的政治生活、经济生活、文化生活、国际生活都很密切。把清史馆组织起来，把清史写好，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应尽的责任。象我们这样七、八十岁的人，即使不能看到清史的完成，也希望它有一个良好的开始。修清史是需要各方面的人材的，其中也需要有整理古籍的人材。同时，通过清史的研究，也

可以在工作中带出一大批人材。当然，建立清史馆，这是一件大事，但我们要呼吁，要酝酿、促成这件事情的早日实现。

关于古籍整理还有一些技术上的问题。如印刷问题、发行问题都要重新考虑，现有的印刷和发行状况，是不能适应我们这个工作的需要的。另外还有跟图书馆的合作问题，跟高等学校的合作问题，跟研究单位的合作问题，跟私人藏书家的合作问题，都要做出妥善的安排。

总之，整理古籍是一件好事、一件很重要的事，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。现在中央重视这项工作，发出了指示。只要我们认真的努力，困难是会逐步的克服的，成绩是会不断的扩大的。在工作过程中，很需要有一个彼此联系的工具。中华书局出版的内部刊物《古籍整理简报》是否可以公开出版，定期发行，扩充篇幅？这对于工作的推进是有好处的。我们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出版的《史学史研究》季刊，从1982年起也要作这方面的工作。

一九八一年十一月

（马福月笔录）

## 整理出版古籍小议

顾 廷 龙

最近获悉陈云同志关于整理出版古籍的意见。这个关系到民族文化遗产世世代代传下去的重大问题，提得非常及时。我作为一个毕生从事整理和保护古籍工作的年迈之人，读后感奋之情，自非笔墨所能形容。小病初愈，草草书此，以示抛砖引玉之意。

一、古籍浩如烟海，整理起来，有难有易。容易的就可集合一些人进行标点、注释和翻译。难的要培训一些专业人员，作好

充分准备，才能开始。老中青三结合是一个好办法，但是班子要搭得好，要真能“结合”，否则劳而无功，过去是有过教训的。

二、我认为古籍中难整理的是“十三经”和先秦诸子。我们不是为了要“尊孔读经”而整理它。章学诚早就说过“六经皆史”，这些书记载着我国几千年的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文化等历史资料。如考证甲骨、钟鼎、简牍、帛书等，都必须参考这些古书。可是这些古书由于年代久远，文字多变，辗转传抄，以误传误。自汉至宋，多次校定，刻之石碑，所谓“石经”。“石经”之刻，在某一时期有校定成为标准本的意义，但还是错乱很多。自宋代版刻盛行，版本多了，但均流传不广。清嘉庆间阮元重刻宋本“十三经”并撰校勘记，当时虽聘请了通经之士参加工作，然而遗留下来的问题还不少。因此，必须先把本子整理一下，校勘一下，以便于标点。一九三二年顾颉刚先生与我合辑《尚书文字合编》，遭逢抗战，一停至今。近蒙领导的关怀，即可重理旧业。惟良师云亡，请益无从。擗埴冥行，陨越是懼。

三、培训专研人员。大学文科应设古典文献学系。创设研究所，将素有研究者组织起来。大学生或研究生都必须具有一定的文字、音韵、训诂、目录、版本的基本功。将来各专一经，分别研究。凡古籍专业人员，能通外语固好；如对外语没有学过或学得不深的，大学生似可许其免修，加深其古汉语的研读。青年中有自学古书而有一定门径或基础，能否破格招为大学生或研究生，广开才路。

四、已经有人翻译或注释的古书，希望速为付印。同一种书，可能有两人的不同翻译本或注释本，由于理解不同，所见必有出入。征集到几部稿子，就印几部。例如《诗经》一书，复旦大学陈子展教授译有全书，华东师大教授程俊英亦译有《诗经》全书。容许“百家争鸣”，不必“只此一家”。

五、要求印刷部门很好配合，成立排繁体字车间，备有完全的标点符号的模子。

六、凡编校古书，必须加以完全的标点符号，人名、地名必须加专名号，如中华书局出版的《资治通鉴》及“二十四史”那样。以前出的标点古书，人名、地名都无标号，实际上是点而不标。

七、编选一部《中国善本丛书》，质量、数量都要超过“四库全书”，分期分批影印出版。过去商务印书馆编印了“百衲本二十四史”、“四部丛刊”，就是由张元济先生主持其事，广泛征求意见，编定目录，分批出版的。现在以国家的力量举办，一定可以实现，可以充分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。

八、徵求专门著作。刻本已很难得到的，稿本、抄本未经刊行的，可就近送交各省、市、自治区图书馆拍摄胶卷备用。原书发还主人。

九、为了提供整理研究工作必要条件，应先摸清家底，编制省、市、自治区图书馆馆藏古籍线装目录或善本目录。

十、为了更好地保护古书，必须认真进行装修工作。装修是一门专门技术。首先要培训保管、修复、装潢的专业人材。现在北京图书馆、安徽省博物馆还有一、二位老同志，技术高超，应从速选派有志此一专业的年轻同志、并有一定基础的去当学生，以资深造。过去办过几次训练班，有的回原单位后就改行了，这是一个很大的浪费。这个教训值得注意。保管人员要热爱图书，政治可靠，有阅读古书能力，能识真(繁体、一般古体)、草、隶、篆四体字，具备一定的目录、版本以及古书装修的业务知识。

## 关于古籍整理出版工作

隋 树 森

听到中央最近关于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指示，我今年近八十

在文化界走了五十多年路的老骥，很兴奋。我愿意遵照指示，跟随同行们一道，为古籍标点整理工作，尽一点微薄的力量，再在文化界走一段路。

整理古笈，标点、注释、译文言为今语，这些工作当然都很重要。如果现在没有人做这些工作，古书必然越来越无人能读，能懂。我想在这些工作之外，再谈一点有关的、次要的问题。我觉得现在有时候想要找一本自己没有的什么古书看，往往很难得到。我认为现在在整理古笈之前，还应当先来一个速成，选择一些比较有用的古书重印。当年商务、中华、世界、开明等家经过挑选整理过的书，以至旧日扫叶山房、朝记书庄、文瑞楼、会文堂出版的那些石印的带书套的线装书，大部分都是“大路货”、常用书，都应当加以挑选，拟定书目，印其可印者。有些书，已经四五十年没有新印本，而其书又确实有参考价值，现在到中国书店又很难遇到，这类书都可以重印。又如商务印书馆的“四部丛刊”初、二、三编，中华书局的“四部备要”，当时选印也颇为考虑斟酌，其中所选的书一般都极有用，这些书都可以印简装报纸本。商务的“丛书集成”，也可以增补种类，改装重印，以供应急需。现在到旧书店买书，一般是种类少，即使有比较好一点的书，也昂贵异常。为了方便经济上不充裕的知识分子和其他文化工作者，这种状态应当改变。

关于整理古籍，中央已成立规划小组，这当然很必要。确实应该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机关，把工作抓紧。我觉得先有一批人把书目定出来，再有一个领导机构，能有人很好地与参加工作的专家经常做适当的联系，如目前各出版社组稿的办法，约稿、催稿，即可。工作者的报酬，与现在的出版社的办法差不多，也就行了。我看，用不到组织固定的工作（指业务，非行政）单位，如“修书馆”之类。以免旷日持久，糜费国帑，搞不出成绩来。这种工作，也可以定出“生产责任制”，讲一点经济效果。当然，更重的是给那些老年人一个适当的工作条件，让他们能发挥所长，把

要工作抓紧做好。

目前，第一步工作是要搞出一个准备重印、标点、编辑、注释或今译的目录来。这些事，可能中华书局有旧档案可以利用。有了目录，再进一步考虑某书请某人或某些人搞。不空谈，要求出成果，收实效。如此，成绩其庶几指日可待矣。

这里，我想附带谈一谈旧日的工具书的重印问题。我觉得旧日的字书、类书等，对于读古书者有极大的用处。其重要者应首先加以整理重印。例如字书《说文解字注》（段玉裁著），上海古笈出版社经过整理，即将出版，这对读古书者是很有帮助的，古人不是说“读书必先识字”嘛！又如《佩文韵府》、《渊鉴类函》、《骈字类编》、《经籍纂诂》等书，也都十分有用，往往能解决《辞源》、《辞海》之类新工具书解决不了的问题。然而现在的青年同行，有几位能使用这类书呢？我觉得，前人既然费心血、费时间给我们编成了这些有用的书，我们就应当充分地利用它。即如《佩文韵府》，我认为仍是搞古典文学的人不可或缺的工具书。今天的文科专业者，谁有那么大的精力，记忆那么多的词汇及其出处来历呢？战前商务印书馆把《佩文韵府》编入“万有文库”中，增加了四角号码索引及笔画索引，等于把这部书的功用提高了十倍八倍，像这部书，就不妨照“万有文库”本重印，又如《渊鉴类函》，也不妨用些时间，给它编一个精确易检的索引，提高它的功用。这类书，旧时本来供吟诗撰文者找词汇、寻典故用的，今天我们主要可以把这些书作辞书用。然而如果想些办法制出有用的索引，对于今天作诗撰文者，也能一样地有用，这就要多费一些脑筋了。



## 古籍整理的五点建议

戴逸

中央决定加强古籍的整理、出版，这是十分英明的决定。我国历史悠久，古笈丰富，古代文化极其光辉灿烂。今天，为了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平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，当然要吸取和继承我国的文化历史遗产。古籍的整理并不是无足轻重、可有可无的工作，而是社会主义伟大建设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。

### 一、要大大加快整理和出版的速度

建国以来，我们也出版了一些古籍，但数量太少，据《古籍目录》所载，1949—1976年出版古笈共约2500种，每年平均10<sup>0</sup>种，这与我们拥有的丰富浩瀚的古籍数量很不相称。据说，台湾出版古籍，数量多，速度快，他们仅编印清史研究的各种丛书即达八百多种，其中如近代史料丛刊有二百种，明清未刻稿汇编有122种，装潢精致，洋洋大观。

我们已出版的古籍中，有一些质量较高，如标点本“二十四史”，《资治通鉴》，“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”等，但为数很少。大量的是中医书，约五百多种，占20%以上；诗词和戏曲小说，约九百种，占36%；而哲学、历史、地理、政治、法律、经济方面的著作，只占35%；其中还有很多是普及性的选本。有一段时期，只能出法家著作与《红楼梦》，这类书籍印数很多，其他书籍成为禁区。被认为是古代反面人物的著作，如宋明理学等唯心主义思想家以及近代的曾国藩、左宗棠、李鸿章、张之洞的集子，尤其很少整理出版。

我们古籍整理、出版进行得很慢、很少，有各种原因。其中原因之一是没有利用影印手段，而多是标点、校勘、加注、作序，耗费力量多，所花时间长。当然这种较细微的整理是应该做的，而且今后也要加强，但同时必须大力影印古籍。五十年前，商务印书馆影印“四部丛刊”、“百衲本二十四史”，既快且好，嘉惠学术界非浅，似可仿照办理。台湾出书所以多，就是充分利用了影印手段。我们有些大部头书，不必加以标点、注释，如《明实录》、《清实录》，现在国内极为难得。一部四千余卷的《清实录》，售价高达数万元，如果影印，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就能出书。

我们过去似乎有些框框的束缚，不敢大胆放手出版古籍，一是害怕封建毒素的散布，二是害怕古书中的一些错话影响当前的外交工作、民族团结，所以出书慎之又慎。一般出古书都要加序作跋，说明和批判其中封建糟粕，甚至删改古书的内容。当然，慎重从事，一定的把关是必要的，但掌握过严，拖延了出书的时间，增加了出书的困难，至于删改内容，那是完全要不得的。希望古籍整理、出版也要解放思想，相信群众，使古籍出的更快，品种更多。

## 二、对古籍进行全面调查

中国的古笈究竟有多少？哪些可算善本书？有多少抄本稿本？收藏在什么地方？正是言人人殊，至今我们对古籍并无全面的了解，除了前人官私目录所著录外，我们自己没有一本全国的古籍目录，好像一座丰富的宝藏，主人却没有一份帐单。今后，我们应组织力量，进行一次普查，先从若干著名的大图书馆做起，以至一般的图书馆、博物馆和私人库藏。著录书名、作者、卷数、版本、收藏地点、书目解题，这是古籍整理的一项基本建设，也是以后长期搞古籍的工作依据。

还应注意的是：图书资料收藏单位对珍本善本借阅办法应加改进，克服目前借阅和复制图书困难的局面，要积极配合古籍整

理工作，密切同学术、出版界的联系，提供线索，沟通情况，以有利于工作的开展。

国外有不少国内已见不到的珍本书，自从清末黎庶昌、杨守敬从日本带回一些古籍之后，不断有学者在国外摄制胶卷携回祖国。解放以后，此项工作中断，建议有计划地派人到国外去调查和复制古籍，如日本的东洋文库、英国伦敦博物院、美国国会图书馆、哈佛燕京学社等，度藏极多。例如美国家谱学会所藏我国家谱有4500种，藏量之丰，在全世界首屈一指，国内近几十年来家谱多遭焚毁，应复制携回；又该学会所藏中国地方志有五千种，可与北京图书馆相比，其中必有不少在国内已失传的本子。

### 三、应重视清代典籍的整理出版

过去的古籍整理，很重视汉简唐碑、宋元刻本，这些当然都是国之瑰宝。但清代二百六十年遗留下的典籍，汗牛充栋，不计其数，时间离我们很近，古籍中的内容与现实密切有关，而且过去不受注意，许多书籍无人整理，尘封蠹蚀，日就渐灭，值得我们大力注意。

清代以前和清初的古籍，四库全书的正目和存目，共列一万多种，而四库以后的书，据孙殿起《贩书偶记》所列，就有一万六千种，可见其数量之大。如以文集论，现在的历代文集约八千种，清代文集占五千种；如以地方志论，现存历代方志八千五百种，清以后的方志占六千多种；其它经籍、史籍、丛书、类书、笔记野史，清代均占极大的数量（这里姑且不论数达九百多万件册的大内档案）。但清代的典籍，整理得最差，出版的也较少。清以前的古籍，在编纂四库全书时，予以总结性的整理，虽其观点、方法，有很大缺点，但总算是作过整理，许多人花了力气，书籍的源流、状况、分类、版本、内容，都作过一些考证分析，而清代典籍十分杂乱，无人研究，至今弄不清全部典籍的情况和收藏，还有大量的稿本、抄本，分散各地，如不迅速复制，

恐将消灭无存。

清代典籍中尤应注意少数民族的典籍，如满文老档，十年前日本已翻译出版，台湾也已印出一部分，而我国呼吁多年，进展仍不快，今翻译注释已完成，但全部印出尚须几年之后。听说布达拉宫和西藏寺院有大批藏文史籍和经文，国外已有许多国家设有西藏研究中心，随达赖出走的一些喇嘛学者，携带不少资料，在国外陆续翻译出版，“藏学”已成国际学术界的热门。我们也应投入力量，研究西藏的历史、宗教、整理藏文典籍，赶紧补上空白。

#### 四、培养人材、设置机构

整理古籍，工程浩大，而且是长期的任务，应设置专门机构，负责全面规划，组织人力及印刷出版事宜。古籍整理最大的困难是缺乏专门人才，此项工作需要专门的知识，要有一批年富力强、刻苦努力、甘心长期坐冷板凳、钻线装书的专家。现在老一辈的专家凋落殆尽，后继乏人。培养人材是各条战线都存在的问题，而古籍整理方面尤其迫切，没有人，诸如调查、搜集、保管、复制以及标点、校勘、注释、编选等工作都无从进行，而培养人材不是一年半载就能奏效的，即使立即抓这项工作，也要在五年、十年之后才能见效，补充较多的新鲜血液。

#### 五、经 费

整理、出版古籍，要有一笔经费，这样才能和一般出版物分开，加快速度。现在的出版社，以经济办法管理企业，过多地考虑利润、奖金，不大愿意出版较难排印，而又要亏损的古籍。有些单位的同志，整理了各种资料和古籍，但找不到出版的地方，稿件长期积压，故而，不是出版社预先约定，大家都不敢动手，怕劳而无功。这样就大大影响了古籍整理的积极性和速度。建议国家设置古籍整理出版的基金，其用途一是开支印刷出版费用，承担其亏损；二是建立古籍资料中心，进行调查复制，以利工作开

展；三是给专家们以适当的报酬，听说由于出版社稿酬太微薄，有的同志整理古籍，自备纸张，自行复制或请人抄写，出版后的酬劳尚不足以偿付其垫支的经费。为了促进古籍的整理出版，设置此项基金是十分必要的。

## 贵在坚持 首先抓史

郭 预 衡

看到陈云同志关于整理出版古籍的意见，其中讲到要使后代都懂得古籍，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。这不仅是要让少数专业工作者研究古代文化遗产，而是要让更广大的人民群众都懂得古代文化遗产。广大的人民群众都懂得古代文化遗产，我看这也是提高民族自信心的一个重要条件。

今天整理、出版古籍，不同于从前的“保存国粹”。目的是积极的，眼光是远大的，工作是有意义的。这意义不必多说。我要说的是：积几十年来的经验，我们有些工作常是有头无尾。有时是定了规划，作了一段，便中途而止，不能坚持下去。不见成果，是很可惜的。但这一次是要定长期的规划，看来不同于过去，决心是大的。我看这是个重要的前提。有了这个前提，规划才不难实现。但贵在坚持。

关于规划，我认为全国要有个统筹安排。目前，除了有关的书局、出版社都在制定规划之外，有些高等院校也在考虑规划。安排项目，组织人力，各方面也正在进行。这中间难免“所见略同”，同样的项目，彼此重复。我想，在各地方、各单位动手之前，最好有领导地统筹一下。下面也要互通情报，不要搞“先下手为强”，而要“分工合作”，以便节约人力物力，提高工作效率。

整理，出版，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，先抓什么，后抓什么？轻重缓急，如何考虑？这可能是言人人殊的。我的意见是先抓历史。我觉得让我们的子孙后代都懂得历史，极为重要。前人说过：“欲亡人之国家者，必先亡其史。”一个民族，如果不懂得自己的历史，就不免要丢掉自己的传统。丢掉历史传统的民族，是容易被人灭亡的。明末清初几个大学者如顾炎武、黄宗羲、王夫之等，都很重视历史。鲁迅先生也非常重视学习历史。他曾说过：“无论学文学的，学科学的，他应该先看一部关于历史的简明而可靠的书。”我看这是最低的要求。更高的要求就是要让广大的人民群众、子孙后代都能懂得更多的历史。

这些年来我们已经抓了二十四史的标点，这个工作抓得很好。但距离使后代都能读懂，还差得很远。怎么办呢？中国的历史这么长，史书又这么多，单是“正史”，古人就已经感叹过：“十七史从何读起！”二十四史又怎样读法呢？再说，要更多的人都能读懂，就需要加以“今译”。但二十四史如此之多，都能今译吗？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。节译呢？选择呢？也都值得商讨。

“正史”之外，还有很多“杂史”、“野史”，也很重要。从前有的学者看不起野史和杂史，但鲁迅先生是特别看重这类史籍的。他认为这类史籍有时更能反映历史的本来面貌，是不可忽视的。因此，在今后整理、出版史籍的时候，可否考虑首先标点一套杂史或野史？有的也可作些今译。当然，这只是个人的想法，未必符合广大群众的要求，聊备参考而已。



## 关于古籍中有些混乱字体 和避讳字的清理问题

阴 法 鲁

我国的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，主要保存在古文献中。中央负责同志关于加紧整理古籍，以免文化中断的指示，具有重大的深远的意义。我们要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，就不能不对浩如烟海的古籍进行有计划的整理，剔除糟粕，吸取精华，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；而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不是少数人的事情，因此，古籍整理就必须面对广大的读者。

古籍整理包括标点、校勘、注释、今译、考订、评论等环节。整理的古籍，一部分是供专门家用的“研究本”，而更多的则是供多数人阅读的“普及本”，今后在今译方面应当下更大的工夫。

普及本要用简体字印刷，有些还要译为现代语，所以古籍校勘的任务除了解决文字讹误、字句误增、遗漏或颠倒，以及篇章错乱等问题而外，还要解决文字的形体纷歧和由于改正更换所造成的混乱问题。这后一个问题，归纳起来，可以分为以下各类：

(一) 异体字 如“蜂”或写作“蠶”，“算”或写作“筭”、“筭”，“睹”或写作“覩”等。

(二) 假借字和古今字 如“悦”或写作“说”，“早”或写作“蚤”，同一“辟”字可用作“避”、“僻”、“譬”等字，“以”或写作“已”等。

(三) 避讳字 古籍中有四种处理方法：(1)缺笔，如“玄”写作“𠄎”，一般缺最后一笔。(2)换字，如唐代人讳“昞”，把天干中的“丙”也改为“景”。(3)删字，如唐代人讳“虎”，《隋书》(唐初

编修)中把人名“韩擒虎”改为“韩擒”。(4)用代称词,遇到避讳字时即避而不写,而用“某”、“讳”、“上讳”等字眼指代。

古籍校勘者针对这种情况,已经改动了一些字,把异体字和部分避讳字改为正字,如改“蠡”为“蜂”,改“景午”为“丙午”(纪年或纪日),人名“韩擒”下加“虎”字;但为了慎重起见,一般对原文的字体不多改动,特别是对假借字不直接加以改动,而注明“说同悦”、“蚤通早”等。这样,只能清理一部分混乱字体,而改正的字体中有些又必须加附注。今后出普及本时,混乱字体改正统一的幅度是否可以考虑适当放宽?凡确定的公认的异体字、假借字、古今字、避讳字等,都可以直接加以改动,不必每字都加附注。当然,对有争议的字,或只根据探索性的见解,并无真凭实据,不应轻易改动原书的文字。

还有些专用词汇,如古代祭天的祭坛称为“圜丘”,即“圆丘”。唐代武则天造“曁”字,作为自己的名字,这个字和“照”相同。它们适用的范围极窄,这类字是否更换?

清理避讳字的问题比较复杂。有些避讳字是容易辨别的,有些并不容易辨别。如唐代人改“世”为“代”,改“民”为“人”,改“治”为“理”,在有些情况下就不容易回改。还有改动较大的,如《隋书·高祖纪》说:“颁青龙符于东方总管、刺史,西方以驪虞[符]……。”这里的“驪虞”即“白虎”,是为了避“虎”字而采用的代称词。有些删字避讳的语词,如果一律补足,有时会影响原文的语句结构。如《隋书·韩擒虎传》在比较贺若弼和韩擒虎两人的特点时说:“其倜傥英略,贺若居多,武毅威雄,韩擒称重。”在这里,“韩擒”下如加“虎”字,“贺若”下就要加“弼”字,才能保持原文的对仗特色,但这样增补,又打破了这一组语句原有的四字格式和节奏。

校勘本来是为了恢复古籍的原貌,如再清理混乱的字体,可能对古籍原貌有所影响,但不会影响原意,却便于阅读,还是应当尽可能地加以改正。今提出这个问题,希望大家指正。

# 我的一些想法

刘 乃 和

整理古籍的问题，目前已是刻不容缓的事情。我认为有几件工作要跟上来：

## 一、加强文化知识的教育

最近几年，我在教学实践中，感到必需加强讲授甚至普及祖国文化系统知识，和中国历史知识，只有在这方面加强，才有利于继承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。有的中文系、历史系的学生，看不懂古文，甚至有的学生看繁体字、直行排印都有困难。这情况别的系还可以，文史两系不可以。有人认为“吴赵两家结秦晋”是吴国和赵国联合了秦晋两国，因此想不出这是什么朝代的事。有人误把康雍乾当作人名。这虽然是个别的，但也很不应该。

我在北大历史系给留学生讲课时，班上有个瑞典同学，仅二十一岁，来中国前学过古汉语，因此看繁体字比看简体字还熟，读文言文（读《史记》）比看报纸还快。谈起刘知几《史通》来头头是道。和他在一起上课的中国学生，有的反不如他的知识面宽。难道我们的学生比他差吗？不是，只是我们的很多同学过去没有接触祖国文化知识，所以懂得太少，在这方面缺乏起码的常识。以后应当在小学、中学适当加强祖国文化知识的教育。

## 二、重视古籍整理人材的培养

现在动手整理古籍很重要，但更重要的是在整理的同时，培养今后更多的能做古籍整理工作的人，要使整理古籍的事业后继

有人，并要后来居上。

趁着现在六七十岁的老先生还健在，趁着他们还能教课、工作、写文章，赶紧培养接班人。培养办法很多，主要的应抓两方面：一是培养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，这样培养，时间虽较长，但为长远打算，不能放松，这是百年大计。一是由老先生在实际工作中带徒弟，青年在工作中做老先生的学生，又做老先生的助手，随时请教、研讨，尽快把老先生专业特长学到手。这二者不能偏废。

### 三、多出版文史古籍书

现在买书，价钱较贵，且难买到。古旧书固然难买，新出版的古籍也不易得，而且有时并不能及时了解最近出版了什么书，消息不通。报上偶见广告，去买早已卖完。

北京已感不易，外地更为困难。今年暑假兰州大学一教师，因要开“史记研究”课，但在兰州竟没有借到、更没有买到《史记志疑》，来北京复制，复制费用一百多元（听说此书最近中华已出版）。象这样较普通的书都买不到，势必影响研究工作的进行。

大学设“文史工具书使用法”课，因买不到足够的工具书，有些书就只能在课堂上空讲使用法，但无书使用，无法实习，成了纸上谈兵。同学自己想买一册备用也买不到。所以已编好的工具书应重新出版，数量也不能太少。

文史古籍书，注释来不及的可先点校出版，点校来不及的可先断句出版，象《四库总目提要》一样，断句也来不及的可先影印原书，以后有力量再整理。有纸型的，可先印一批，以应急需。如《四部丛刊》初编，影印后可整部出售，也可散本零售。如《册府元龟》、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等，都应赶快出版，以利各地参考。

### 四、组织人力编撰工具书和资料汇编

过去因有人认为编撰工具书和资料，都不是研究工作，因此

有人不愿做。陈垣老师在二十年代就呼吁整理史料的工作，并身体力行。他在《中国史料的整理》一文中，曾提出过对史料整理工作的设想，也包括工具书的编纂。他说这类工作是“一人劳而百人逸，一时劳而多时逸”的工作，不能忽视。他说“兹事甚细，智者不为，然不为终不能得其用”。这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话。今天我们要发挥愚公精神，把这类工作做好，使后来进行古籍整理时可节省人力、提高质量。我看应当在社会舆论和制度规定上都体现出对这类工作的重视，使更多人乐于参加这类工作。

我们北京师范大学于去年(1980)八月底建立“中国历史文献教研室”，体现出我校、系两级领导的远见。但我们人手不多，力量有限，目前教课任务重，水平不高，尚无所建树。今后要努力建成专业，在培养人才和古籍整理的任务上，贡献我们的力量。

1981年11月

## 整理古籍与选择版本

冀 叔 英

继承发扬我国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，也关系到子孙后代如何建设高度精神文明的重大问题。这自然要从教育入手，要读点古书，这就有个先决条件，一要有书，二要读得懂，所以整理古籍在当前应是文教方面的一件大事。

近代出版界前辈中，为整理出版古籍作出重大贡献的，要数张元济先生；他倡导经营影印“四部丛刊”和“百衲本廿四史”，至今通行全国，因为在选材、蒐访版本方面，都下了很大功夫，至今这两部大书，仍被公认是嘉惠学林的较好的本子。“四部丛刊”在选取底本时，是经过周密考虑的，每种书都尽可能选用当时传世最好的版本，可是在选好后还有改易另一本，或补入原

佚篇章或缺叶缺字的，读张氏《四部丛刊成记》、《重印四部丛刊成记》，可想见厥功之艰。所云：“书囊无底，善本难穷，随时搜访，不敢自足”（见《四部丛刊成记》），实是纪实之言。因为选什么本子为基础，一切标点、注释、校勘、今译等工作，都是在此基础上做的。当年影印“四部丛刊”、“百衲本廿四史”的工作经验，还是值得我们工作同志借鉴的。比如“百衲本廿四史”中的南北朝七史（《宋书》、《南齐书》、《梁书》、《陈书》、《魏书》、《北齐书》、《周书》），都以南宋初眉山刻本为底本；七史书版刻成后，南宋时即移送杭州作为国子监本，入元，版归西湖书院，明初移送南京国子监，经过多次修补再印，成为地道的三朝递修本。这些传本中缺叶空白、缺字之处甚多，影印时曾用多本互勘，尽力选用较早印本，用力之勤，俱见张氏《涉园序跋自述》。如《南齐书》，自明以来原缺四叶，明代南监、北监汲古阁本，至清武英殿本皆缺。傅增湘购得《南齐书》眉山本，经章钰校阅，发现其中志第七的第三叶（州郡志）、列传第十六的第十叶，此本俱有；几位老先生对这一发现喜出望外，影印时即用傅氏此本为底本。这也可见选材既定之后，选用何本为校勘底本是相当重要的。又如《盐铁论》一书，宋、元旧本不传，传世以明弘治涂楨刻本为最好亦较早之本（《邵亭书月》和《邵园读书志》所称十三行元小字本，实系明初建本），“四部丛刊”影印时，在究竟何本是真涂楨本问题上，傅增湘老先生和叶德辉发生了一场激烈争论，傅氏认为缪荃孙藏的十行二十字本是真涂本，叶氏则说九行十八字本是真涂本；争执的结果，“四部丛刊”印了九行十八字本，实际傅氏的话是对的（后再印时已改）。这段小故事或也可供今后选材方面参考借鉴。为了适应当前需要，古籍译成现代语文，使更多的人都能接受，这也是个新课题，因为过去这方面作得还不多。怎样有计划地选材，较系统地编出一批选读目录，列入古籍整理全面规划之中，还需各方面人士和专家们都来提供意见。